◆杂　谈

有争议的基本权利也应救济

近期媒体报道，河北涿州一高三女生因没有户口，无法报名参加高考。而该女生没有户口的原因是，因她是二胎，全家为了躲避罚款，遂一直东躲西藏、辗转四处，最后在河北涿州定居下来，而女生上户口的问题也就一直耽搁下来。

不同于常见的行政不作为、政策衔接不畅导致的权利受损，这名女生的户口问题乃是由其家人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所导致，动因在其家人逃避罚款。就此而言，如果将该女生所欲求的户口称之为一种有争议的权利，当不为过。

那么，问题就是，对于这一有争议的权利，应不应当提供救济？

在我们国家的制度设计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但户口关系决定着公民一系列基本权利的完整实现，比如受教育权、劳动权、婚姻权等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导出，户口也应当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种，也就应当是普适性的、无条件的，不能因任何原因而被剥夺、漠视。即便国家在这一权利前设置了许多条件，对这一权利的获得提出了许多要求，但就算条件不具备、要求不满足，政府也不能剥夺公民此种权利，也不能漠视公民的权利缺失而没有救济。

政府无条件对有争议的权利予以救济，是否伤害了公平原则？的确，当其他人都为获取这一权利而满足前置性条件之时，没有满足条件者依然获得了权利，这对其他人确有不公平之嫌。当然，理想的状态是，这一权利的获取不应有人为的前置条件。但既然政府在管理中设置了前置性条件，那么这一条件的满足就应当作为一个考量的标准，否则，政府的管理制度将沦为毫无意义的“花瓶”，丧失必要的约束力。但这不免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无条件获得相冲突。合适的做法是，政府可以在事后要求当事者弥补应予满足的要求与条件，可以进行必要的追偿。

在户口问题上，一方面，国家制度设计已经将其强化为决定基本权利完整实现的基础性条件，理应被合理推导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另一方面，政府对户口权利的保障相对脆弱，远远没有达到将其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来保障的程度，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常常以前置性条件为要挟，剥夺之、漠视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公民基本权利极易受损，权利救济求告无门，国家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就不能忽视这个漏洞。（2015年9月18日《长江日报》岳乾）

从“颜回窃饭”看管理

话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桃李满天下，贤人弟子72；但在老夫子从教过程中，一直是过的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惨淡日子。一日，困顿颇久的老夫子和弟子们终于有了一些大米，一番合计后决定蒸米饭，以飨口腹之欲；但问题来了，大家都饿了这么久了，到底该派谁去蒸米饭？谁去监督？

一番思量之后决定由老夫子德行最好的大弟子颜回代劳，子路代行监督。结果子路去后院隔窗查看颜回蒸米饭时，发现颜回正在急不可待地用手抓了米饭往口里塞，大惊之下，飞报老夫子。老夫子一声长叹，道一声：“还是待颜回端来米饭再说吧！”。

待颜回端来米饭，老夫子道众人：“今日有可饱腹之米饭，我们还是先敬祖吧！”颜回一听惶然道：“先生不可啊？”老夫子微笑道：“却为何？”颜回道：“这米饭我已经用手抓过了，不干净，不可以敬祖啊。”“不知你为何要用手来抓啊？”老夫子问道。“弟子蒸米饭经验不足，约莫着米饭要好之时，一下子打开锅盖，结果厨房年久失修房梁上全是长长的灰虫，热气一扑都掉锅里了，弟子一急，不忍让先生与众师兄弟吃脏米饭，一急之下，就用手抓了脏米饭吃了，现在先生可以和师兄弟们吃相对干净的米饭了，但不可敬祖啊。”

现在我们可以从管理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有趣的故事。

首先从任务的分工上来看，有问题吗？很显然，老夫子的安排还是深谙识人用人之妙；岗位安排、目标职责都很清晰，也有最适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在岗，制度没有问题。

从沟通上来讲，故事中间，算是颇有波折，正也可以带给我们深深的反思：首先，老夫子作为领导人，假如一开始偏听偏信，不做调查落实，不给机会辩解，结果会怎样？答案显而易见。从颜回来讲，遇到表层米饭脏了这种小问题，是有事无事、不管大事小事，一律上报以待上峰解决，还是便宜处置，无伤大局？依笔者来看，颜回的当机立断还是相当的正确。从子路的角度来看，行监督职责，恰遇到颜回窃米，飞马回报，也是没错，职责所在，无可非议。

现在看起来就很清晰了，领导人、执行者、监督者都在职责范围内做了恰当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回到那个假如，假如落脚点还是在老夫子身上，老夫子如果偏听偏信、简单粗暴，事情完全会是另外一番结果。老夫子并没有直接去问颜回为何偷吃米饭，而是以敬祖引出问题，实在是高明之举，于风淡云轻之中，把颜回引入道德的角度，而颜回本身又是以德行名闻天下，他敢有不敬、欺祖之心吗？于是乎问题背后的秘密自然而然地揭开了。

从故事的表象来看，我们不可偏听偏信、简单粗暴，不可为表象所蒙蔽；从深层来讲，日常管理中的沟通，我们还是要有度量，有技巧，做到推己及人。（2015年第4期《政工研究》量子）

◆观　点

不要因误读而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在基层引发了热议。不过，笔者在基层调研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对改革促进派的形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改革大都要打擦边球、闯红灯、突破法律规定，甚至要冒杀头风险，这样的认识不但误解了这一轮改革的内涵，也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

对改革和改革者形象的错误认识。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有一部分改革是依靠打破已有的制度和法律规定，甚至是突破中央精神而实现的，且由于这类改革大多比较有名，媒体的宣传报道也比较多，从而使得这些改革及其做法在干部群众心中印象深刻。比如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当时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按下了手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农村改革也冒了被批判的风险。

现在的改革虽然没有那样的政治和生命风险，但那个年代改革者的形象影响很大，甚至成了改革者的固化形象。在有些基层领导眼中，今天改革还是和冒险联系在一起，不冒险就开展不了改革，冒险成了改革的固化思维。一提到改革马上就会冒出“冒险”两个字。

一些人对改革依然存在顾虑。除了对改革和改革者形象的错误认识外，还有一些人对改革存在顾虑，小算盘不少，这也影响了基层干部开展改革。在面临改革时，有些基层领导在改革大局面前，更喜欢打小算盘，更愿意从对自己有没有利的角度去考虑改革、推动改革。

改革促进派应有新形象。这一轮改革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和法治联系起来，和从严治党联系起来，改革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二是此轮改革更重顶层设计，基层改革工作更多的是执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中，很多改革发轫于基层，基层做了很多中央还没有打算做或还不允许做的事情，所以风险很大，而这轮改革大体不存在这些问题，也少有这样的法律空间，对于基层改革者来说，在顶层设计下，改什么、怎么改都有明确要求。由于改革的时代和要求不一样，所以对于基层改革者来说，这轮改革应该有新型的改革者，也即新型的改革促进派，相对于探索者来说，更需要改革的忠实执行者，相对于冒险者来说，更需要守规矩的善解问题高手。

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促进派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要求，也对改革促进派的角色和任务提出了四点要求。改革促进派的第一个要求是服从，即服从上级的改革决议，并坚决落实，改革促进派是中央改革决议的坚决服从者和执行者；第二个要求是要从大局上来考虑改革，尤其是在决议本地区、本部门改革次序、步骤的时候，有的改革可能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但从大局上来看并不着急，就应该先放一放，把那些和当前大局有关的改革排在前面；第三个要求是自我革命，即要破除个人的小算盘，不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推动改革，要讲奉献；第四个要求是直面问题，即要啃硬骨头，要做实干家。通过“三个有利于”和四点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改革者新的内涵。

因此，新一轮改革者的形象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者形象有很大不同，相应地，基层改革促进派也应有新的内涵和形象。国家应该对改革促进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进行大力宣传，从而破除已有成见，树立新的形象，并以此引导基层干部正确认识改革、开展改革，在争当改革促进派上采取正确的方式。（2015年9月14日《理论周刊》姜志勇）

“升级版的中国”必须依赖全民创新

从2013年3月中国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到现在，两年多过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升级”也早已溢出经济范畴，成为衡量国家转型、民生幸福的不二标志。

很多的人已经行走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感受着，体察着，累并快乐着。尽管有些地方依然有拥堵，有抱怨，却难以阻隔全民放松身体、放飞心灵的努力。而这样一幅“释放”的图景，无疑是一个“升级版的中国”的最佳表征。

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从国务院到各地各部门各层面的简政放权，以及在新近推出的一系列司法改革重大举措，中国的“升级”已在路上。可以预见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改革创新的大门一旦打开，必将出现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局面，当然，也必将冲决那些因为不适应而产生的种种窒碍，蔚成波澜壮阔之势。

中国经济一路走到今天，增长中潜伏着风险，成绩中累积着矛盾，不转型升级则难以为继。而转型的关键，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有可能释放蕴藏在民间的生产力，也才有可能推动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而在社会治理层面，同样存在着诸多短板，诸如一些公共服务的不足，某些方面社会公正的缺乏，民众权利时有被侵犯，乃至部分公权力的肆无忌惮等，都会损害民众的获得感，影响改革红利的全民共享。这些情形无不指向“法的精神”，都在呼唤“人本属性”。可见，依法治国，释放民间活力，已经成了当前社会治理的最强音。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强力推进政府改革，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国企改革……一大波改革措施的出台，必将在相应领域发挥不小的作用，也为当前的经济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这样的努力，也会进一步明确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释放社会、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激发创新活力，让改革红利更多地惠及广大民众。

我们也看到，法治精神正在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词，个案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无论是对“大老虎”的公审，还是市井小民的权利主张，这些活生生的法治案例，普法、知法的同时，也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识。

李克强在9月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必须靠创新、创业突围”，“创新创业是中国发展的‘新动能’。”

一个“升级版的中国”，意味着更强的全民创新能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意味着更充分的法治精神、更多公民权利的实现，意味着更稳定的民生保障、更彻底的“人本属性”。对此，我们满怀期待。（2015年10月1日《新京报》社论）

◆评　论

干部当有『低姿势』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跪射俑令人惊叹：虽经两千多年的岁月磨蚀，依然完整坚固、栩栩如生。何故？专家解读，重要原因是跪射俑的姿势低，其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构成稳定性极强的三角形支撑上体，这种姿势使跪射俑在坑顶塌陷时，也能经受住考验。观跪射俑，让人联想深思：为人做官有道，当持这种“低姿势”的负重品格。

姿势，作为一种肢体语言，乃是一种态度表征，折射内心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修养、素质、品行，就有什么样的姿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自负傲物者，其姿势低不了。修身克己、内敛谦逊、持重坚忍者，其姿势高不了。低姿势不是低三下四的卑躬屈膝，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卑贱人格，更不是低头哈腰的虚伪做作，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生修养和境界操守。对于为官从政而言，“低姿势”才能走稳走好。

春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数朝元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写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每逢任命总是愈加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下腰，连行路都注意靠墙边走。这种“低姿势”使正考父为官一直如履薄冰，克己奉公，政绩斐然。仕途中，倘若执拗摆着恃权傲物的“高姿势”，最终没有不翻船的。从汉代的董卓到清代的和珅，无一不是擅权跋扈、利令智昏而自取灭亡。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责任越重担子越沉。重负在肩，必须有“低”的特质，才能负重前行。唯其低调不彰的平民风格，故能赢得人心；唯有低平不躁的清纯心境，才能淡泊明志；唯其低眉沉稳的踏实作风，方能成就事业。正如古人所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可以说，低姿势是功成至道。

从古而今，放低身段、谦恭待下者，为的是登高望远，海纳百川，成其广大。刘备屈膝求贤，三顾茅庐，连张飞也看不惯，但实现了政治抱负。蔺相如大义为重，容让廉颇，终于化内讧为“将相和”。唐宰相娄师德忍辱负重，即便遭人排挤，依然“恭勤接下，孜孜不怠”，为官终身守节，得以功名始终。古往今来以低姿势为人处世者，最终全的是大局、守的是大义、成的是大业。

应当说，在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权力的“任性”大为收敛。但不能不看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些人很难发自内心地具备那种谦恭谨慎的低姿势。有的人变着法儿想表现权力的傲慢，有的人一有机会就摆谱、摆官架子。甚至有的说：当官无权势，算白当了；做官无好处，算白做了；为官无尊严，算白为了。归根到底，唯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才会有真正的低姿势。

眼睛昏花的孤老藏民见到前来访贫问苦的孔繁森，惊奇地问：“你是谁？”孔繁森答道：“我是您的儿子！”治沙、治涝、治碱的工地上，有人找焦裕禄，眼前皆为一身泥一身汗埋头拉架子车的劳动者，不知道县委书记在哪里。田间地头，戴草帽扛锄头的地委书记杨善洲，完全是一副老农样子……这些共产党人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干部当有怎样的“低姿势”。

（2015年10月9日《南方日报》马祖云）

◆视　界

创新的国度提倡好奇

以色列人都在创新吗？

最近，我和三十几位做企业的朋友一起去访问以色列，那是真受到触动。我们通常是白天访问，晚上讨论一下观感。我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个号称“创新的国度”里，我们究竟观察到哪些新东西？

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头装了希伯来圣经的一段话）。我说，这种装置国内一些地方也有，那是信教家庭的一个吉祥物，不信教当然没那个装置了，何况早就有了的。还有人说，进以色列海关不要求填表（不填入关表）。那么一个敏感地区，签证审查很严格，但只要盖到签证以后，入关手续极简单，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技术和安保技术有信心。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服务有什么不同吗？到圣城看满街的小商贩，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啊？他不也在那儿摆地摊吆喝，整天等着过路的人去买东西吗？特拉维夫的酒店，有什么特别的？固然比我们的宾馆朴实些（没那么奢华），但也谈不到创新。最后，讨论下来大家觉得，也没在以色列看到多少新东西；就直接观察而言，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还不是该干嘛干嘛。

现在以色列人口不到八百万，只是上海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居然拥有3.8万名科学家！它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但你看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十，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发经费则占GDP的4.2%，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则分别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无论到访哪家科技机构，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单子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和以色列初创企业！

所以，兴国之道，就是创造条件鼓励创新，特别要把创新分子汇聚起来。同时，把创新成果覆盖到国民经济里头去。最后，连剃头的、扫地的，都一起沾光。

现在大家都承认犹太人厉害。其实，过去分散在各个地方，哪里看得出犹太人厉害？“二战”的时候，被纳粹杀了六百万。所以，现在回顾当今以色列的成就，最早的起源，可能是那么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聚到一块儿，构成一个国家，有个保护壳；然后让里头最厉害的人，创新出成果，去罩住其他不那么厉害的同胞。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也是聚到一起，才有更多的裂变。比如硅谷。

以色列人的创新源自哪里？

以色列教育，跟所有其他国家教育，特别是中国教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去了以后在IDC（一家商学院），请了一个高学位的拉比（犹太语“智者”的意思，多为传教的长老）给我们讲课。他的题目是：教育怎么塑造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用不多的几张PPT，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他首先说，所有犹太人，人人从小开始，就要接受两本书的教育：一本是希伯来圣经，还有一本叫《塔木德》。后者是两千年来，世世代代杰出的拉比阐释希伯来圣经的思想集合（共250万字，很厚的一大本羊皮书），里头也记录了大量民间智慧、民间故事。

这位拉比讲，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拿这两本书读，要反复读一辈子。他说，所有犹太孩子的妈妈，第一责任就是教育孩子，教育是犹太妇女最重要的天职；从小家庭教育，世代相传。一岁怎么教育？就是给他讲这两本书里的故事。犹太孩子到五岁，基本把这两本书里的故事都听过了。然后就正式跟拉比学习。拉比很讲究学习仪式：第一天上学一定要穿新衣服，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开心的事；对新来的同学，大家要热烈鼓掌欢迎；第一堂课教孩子些字母，是用蜂蜜写在干净的石板上，孩子念完就可以把那个“字”舔掉，或者给小孩发一块糖，每人吃一颗开始学习——使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拉比接着说，以后犹太人怎么来来回回读这两本书呢？靠讨论式的学习。两个人看一本书：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互相讨论。犹太人的教育，不是说拉比讲的就是真理，学生记住会背就行了，而是鼓励挑战、提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思维厉害？他就是从小受这套思维方法的影响。

访问期间，请到以色列第一位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来做讲演。他讲，从小他的妈妈就这样教他：“走进一条河，你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奠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塔木德》里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人们都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反而容易”。

阿龙还说，每天放学回来，犹太妈妈不会问教了什么、学了什么，更不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她就问：今天你问了什么问题吗？你问了有意思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人家的宝贝。实际上，教育要开发智力，提倡好奇、把问题看得比答案还重要。这是以色列人思维真正厉害的地方。

犹太人永远相信：土地会被夺走，财富会被拿走，但知识拿不走（从小就教育孩子这个道理）。这个人力资本理论，终于在以色列找到了一个最彻底的应验场所。（2015年9月21日《北京日报》周其仁）